



性与性别学术译丛
Gender Studies

男人之间

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Eve Kosofsky Sedgwick

[美]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 著
郭 劼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男人之间

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Eve Kosofsky Sedgwick

[美]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 著

郭 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美)塞吉维克著;郭劫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7

ISBN 978-7-5426-3599-0

I. ①男… II. ①塞… ②郭…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②诗歌研究—英国③男性—同性恋—社会问题—研究 IV. ①I561.07
②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3952 号

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著 者 / [美]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译 者 / 郭 劫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特约校对 / 张向玲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200千字

印 张 / 19.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599-0/C·391

定 价 / 38.00元

总序：性、性别与社会建构论

李银河

这套译丛所涉及的领域是性与性别研究，所选作者的基本理论倾向是社会建构论。从1960年代开始，在性与性别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至今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生理决定论渐渐失去了影响力，社会建构论占了上风。而本译丛的作者巴特勒等人正是这场论争当中的主要人物。

从1960年代起出现的性别新概念认为：将某些行为归属于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种社会习惯（就像在英文中将船称为“她”，而其他文化中却不会如此）。社会建构论最初的观点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许多差异都不是源于一个基因，而是许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它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是社会和符号的创

造物。

极端本质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生理决定的；而极端社会建构论则认为：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实。论争双方各自坚持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与此相应的是“自然”与“文化”的两分法。前者强调天生的自然基础；后者强调养育的作用，社会条件，社会权力关系或者个人选择。

社会建构论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多种理论：

第一，性别的文化建构论：性别建构的差异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以及某一文化之内。性别的文化建构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概念和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比如，亚洲文化要求女人被动和柔顺，亚洲女性的人格特征就会被这样建构起来。女性主义不仅强调社会性别文化建构，还强调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建构，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

第二，社会角色理论：男女的心理区别来源于社会角色不同，由于劳动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里活动，男性更多在社会上活动。许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社会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来自身体的区别，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体力大小的区别等，但是更多地决定于社会习俗对性别角色的规定。

第三，心理分析理论：男女两性的起源和发展是长期的争论，心理分析是最早涉足这一问题的。从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可以知道，虽然两性具有极为不同的心理本质、性本质，但是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同性恋、同性恋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的。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被认为是颠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的第一人。他认为，性别结构与权力结构共存，权力在两分的、表面上看去是本质主义的性别区别中是因不是果。根据福柯的观点，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它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形成的。

福柯提出了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和抵抗的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国家的管理技术、医疗和快乐学的知识领域。他的基本观点是，权力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就连压制本身也是生产性的。目前被当作天经地义的性别差异其实是由权力生产出来的。

运用社会建构论来定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的尝试是罗宾(Gayle Rubin)在1975年发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她的理论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类的性和生殖这种生理的原始物质被人类的社会干预所塑造，以传统的方式加以满足，无论这些传统方式有多么糟糕。她强调社会干预在塑造性别规范中的重要作用，摒弃了对性别结构现状的生理决定论的解释。

这套译丛的作者们更是从各自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建构论这一性与性别领域中的前沿理论。这套丛书收入了在这个领域产生过并正在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从哲学、历史、心理、艺术等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远的背景，上面记载着从远古到今天，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建构性与性别的非凡努力和力量博弈。

相信这套丛书能够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性与性别研究领域中最辉煌、最新颖的思想成果，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更新观念，从人类最优秀的大脑的思维成果中受益。

作者自序

我想知道,现在*来读《男人之间》的话,是否可以明显看出,它的写作过程中曾注入了怎样肆无忌惮的快乐:那台奥斯本电脑(重达三十五磅的“手提”)的小屏幕让人想起大众甲壳虫汽车那无法除霜的挡风玻璃;用蜡纸盒子打包外卖的回锅肉,在深深的夜里,滋养了邦庭学院大楼里亮着灯的蜂窝般的小隔间里的我。我的口头禅是,“我本来可能会在食品店打工”——在这个工作机会稀少,女性主义批评成了最受挑战的领域,而终身教职不见踪影的时刻,我却无法解释地感到振奋。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信心——一点都没有,但似乎没有一天不让我觉得,写这本书是一种探险、一种特权。

《男人之间》意图在两个主要方面创新。我当时最先想到的读者是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当我开始本书写作之时,女性主义研究似乎是一种单一工程:那时候,它的开展还远远不够,因此,以一套数量相对较小的有力公理为依据,来对各学科在整个范围内进行女性主义的重新架构,似乎有可能,而且也很迫切。作为一个身为作家、喜欢细读的解构主义读者,我对于自己被提升到激进主义宏大理论的时代旋风中,感到惊讶、兴奋和感激。与女性思想家群体一起奋斗,带来予人力量的乌托邦式的宣告,以及持久的、

* 塞吉维克这篇序作于1992年本书再版之时,此时距书的初版已有七年。——译者注

男人之间

日日更新的振奋——我对此产生了迅敏的反应。同时,就像其他许多女性主义者一样,我也希望——需要——出现不一样的女性主义研究。特别是,制度、概念、政治、伦理以及情感上的各种不同的偶然性允诺(威胁?)用一种“干净明了”的方式,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妇女研究领域的发展中,简洁地排列起来,而在该领域中,研究的主题、框架和政治意义,以及研究者本身,可能都会被等同于女性(the female)——我觉得这种“干净明了”的方式具有压迫性。在参与这些偶然性的同时,我仍然需要尽可能相信一种顽固的直觉,即,有关身分(identity)的细枝末节,与身分、欲望、分析和需求都能被整齐地或中心性地放置的那些地方相比,是更丰饶的研究沃土。

我写《男人之间》的意图很清楚,是希望它为女性主义运动——对于与这个运动的认同,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作出复杂化的、反分离论的(antiseparatist)、反恐同的贡献。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关于认同(identification)和以读者为导向的论述风格(address)的移情式诗学(transferential poetics)从来很简单;它们并不简单。本书的暗藏的观点和晦涩影响了各种女性读者对它的领会,但在当时,更古怪的似乎却是它与潜在的男同性恋读者之间那鬼魅般的关系。

几年后我遇到了迈克·林奇(Michael Lynch),他是同性恋研究领域长久以来的一位开拓者。他告诉我,他对《男人之间》的第一反应是,“这位女士对很多东西都有很多想法,但她对男同性恋者所知甚少!”他说得没错。在写作《男人之间》期间,我对涉及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文化和批评十分投入,但在真实生活中,我只认识一个公开的男同性恋者。1990年代的今天,学术界已经出现了精细的、行动主义的男女同性恋研究景象,出现了听得见、看得到的全国性的男女同性恋运动,而且(对我和其他有着各种不同性向的男性和女性而言),还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繁衍极强的酷儿群体,它的直接基础是各种性别、各种种族和各种性向的定义中发生的认同与欲望的交错——从1990年代的这种视角来看,很难记起那个遥远的国度感觉起来是什么样的。现在重读这本书,我常常被迫停下来,

为它的许多分析和概括所依据的经验的薄弱而感到郁闷。但让我松了口气,并感到骄傲的是,它的主要动机和任务似乎仍然易于识别。

那个时候,美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场不断壮大的男女同性恋研究运动(如果回顾林奇主编的《同性恋研究简报》,可以看到,这场运动有多么地活跃,同时也多么地危险);无数的城市空间中,正在创造出一个极具活力的同性恋解放的文化。因此,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本书为何依赖了一个更为邈远的同性恋思想传统——主要是英国或欧洲的传统,即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盖·霍昆海姆(Guy Hocquenghem)、保罗·霍赫(Paul Hoch)、马利欧·梅利(Mario Mieli)和阿兰·布雷(Alan Bray)的著作。这些文本已经出版成书,或有了英译本(如果原文不是英文的话),它们是作为经典的、或地位已确认的研究资料而出现在《男人之间》里的,而它们的作者可能——无论《男人之间》如何将他们与当代拉近——已经死了一个世纪。在这本书里,他们是作为一种几乎是神学式的推测性思考的对象来发挥作用的,而不是作为当下实际中的生命和群体的证据。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的年轻作者*身上有某种压抑不住的狭隘。如果我把那种狭隘性描述为不仅量出了她与同性恋男性创造性(gay male creativity)——对它的乌托邦式的启用成了本书的驱动力——的各个场景之间的距离,而且也是她与它之间那种热情的、酷儿式的,而且颇为奇异的认同的基础,是否有道理?

毕竟,对欧美同性恋男性的某种现代身分的创建性叙事——它比巴尔扎克还巴尔扎克——是沿着从狭隘的地方性源头向大都会式的归宿而延伸的路线进行的。由于每一个个人故事都始于对酷儿童年的提炼,我们带着强迫、带着痛苦,在手头仅有的镜子——即原子化了的、以繁殖为目的的、所谓的异性恋的未城市化(pre-urban)或前城市化(ex-urban)的起源性核心家庭——中,错认了我们自己。这种核心家庭带来的不恰当

* 显然,塞吉维克此处指的是自己。——译者注

男人之间

的损伤性干预可能会伤害我们,而那些足够柔韧或足够幸运,从而存活下来的人,则会获得生命,一种不同的生命。那种晚到的第二生命,那些新建构的并去自然化了的(denaturalized)“家庭”,那些姗姗来迟、充满疑惑、造就出转化了的或转化中的自我承认(self-recognition)和他者承认(other-recognition)的机会——产生这一切的场所就是大都市。但大都市是通过吸纳来自地方的那些充满怀疑的能量,而得以不断重新充员、重新建构的。或者——我换一种更好的说法——大都市吸纳了“怀疑”(incredulity)本身的地方性能量。

这本书的作者似乎不太相信男性同性恋群体存在的事实,尽管这本书如此明显地渴求这样一个读者群。这种渴求制造了这种“怀疑”。然而,它也制造了与至少一些读者之间的一种纽带力量——这本书自己那种私密的、充满欲求的、直接的论述风格来自文化权威、性别/性和学科性(disciplinarity)所构成的版图上一个不寻常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确定的位置,这些读者在遭遇这种风格时(在那个邈远的时刻),同样心存怀疑。

痴迷(obsessions)是知识资本最持久的形式。因此,在事后去批评痴迷,或许是愚蠢的做法,尽管这项由痴迷驱动的研究所提供的知识能量似乎显然在字里行间也带着深深的障碍。障碍和凝滞似乎已经成了它的论述风格的特征,尤其是对许多女性酷儿读者而言,因为它也引发了她们那充满怀疑的欲望。实际上,《男人之间》持久地激发着许多读者的怒火(或许还有其他反应)。对此,我相信几乎所有有力地运用过它的读者,都曾依赖过对它的一个几乎同样多样、同样矛盾的反应谱系。这个领域内那么多后继研究的激增和卓越的创造力可以证明——我希望如此——像《男人之间》这样的非常规的文学研究,有着直接或迂回的强劲活力。但是,对于已经长久深植于酷儿解读的多重历史中的那些持久、精彩的增殖力,思路上的开阔,以及大胆,渗透力,和运动参与,都还有很多论述的空间。

1992年11月

目 录

作者自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性别不对称与情欲三角	27
第二章 恋爱中的天鹅: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为例	35
第三章 《乡村太太》: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剖析	63
第四章 《感伤的旅程》:崇性主义与世界公民	85
第五章 走近哥特式小说:恐怖主义与同性恋恐慌	104
第六章 内化了的谋杀:《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	121
第七章 丁尼生的《公主》:七个兄弟一个新娘	147
第八章 《亚当·比德》和《亨利·埃斯蒙德》: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女性的历史性	167
第九章 恐同、厌女和资本:以《我们共同的朋友》为例	200
第十章 登上后门的阶梯:《爱德温·德鲁德》和帝国的恐同	224
结语 走近 20 世纪:惠特曼的英国读者	251
参考文献	275
开拓者:塞吉维克《男人之间》及其他	287

引言

1. 同性社会性欲望

本书讨论的是英国文化中相对较短、较新、较易理解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主要在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的小说中得到具体体现。对不少领域的理论家而言，这一时段的魅力显而易见：这个时期在经济、意识形态、对性别的处理等诸方面产生了浓缩的、自省的且影响广泛的变化。我的主张是，伴随着这种变化而来的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 desire）这一连续体（continuum）的结构中产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紧密地，并且常常是因果地与其他更显眼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男性之间的友谊、师生关系、权利关系、对手关系以及异性和同性恋关系等新兴模式与阶级有着密切的、不断变化的关系；该模式中的任何因素都不能脱离它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或脱离作为整体的性别系统来理解。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本书书名中的这个短语是用来标示歧视和悖论的。首先，“同性社会性欲望”这种说法是一种矛盾修辞。“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一词偶尔在历史或社科领域中得到使用。在这些领域中，它用来描述同性别的个人之间的社会纽带。它是个新词，显然是对应于“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而形成的，而且显然是用来区别于“同性恋”一词的。实际上，它被用于描述“男性纽带的形成”（male bonding）之

类的行为,而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一些行为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恐同情绪,即对同性恋的恐惧与憎恶。^[1]因此,把“同性社会性”拉回到“欲望”(desire)的轨道上、拉回到潜在的性爱上的做法就是在假设,同性社会性与同性恋之间的连续体很可能是不可打破的——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对男性来说,这种连续性体的可见度受到了强烈干预。在我的论述中,我会阐明,我这个关于该连续体不可打破的假说并不是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我并不打算将涉及肉体的同性欲望作为男性同性社会性(male homosociality)其他形式的“基础”来讨论——它只是一种概括性的策略,用来标示出男人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的种种历史差异。“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正是本书对这整个连续体取的名称。

用词上我选择了“欲望”而不是“爱情”(love),是为了表示对肉欲问题的强调,因为,在文学批评话语及相关话语中,“爱情”更多的是用来命名一种具体情感,而“欲望”则用来命名一种结构;本书的批评辩证所依靠的是关于社会驱动力的结构性变化的一系列观点。大体来说,我对“欲望”一词的使用类似于心理分析对“性本能”(libido)一词的使用——它描述的不是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或情绪,而是情感力量或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像胶水一样,决定了一种重要的联系,虽然它有时可能表现为敌意、仇恨或某种不那么情绪性的东西。这种力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与性相

[1] “恐同”(homophobia)这个概念本身也充满了难点。首先,这个词在词源学上看是荒谬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由于“恐”(-phobia)这个词缀汇聚了恐惧(fear)与憎恨(hatred)的意义,在使用中,就容易对压迫同性恋的原因做出预先判断:它会被归咎于恐惧——比方说,作为对权力、特权或物质的欲望的反面出现。另一个更能点出这种压迫的集体性、在结构上的渗透性及其物质基础的词是“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

然而,出于三个原因,本书将继续使用“恐同”一词。首先,这儿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探究——而非强行坚持——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假设上具有对称性的对立关系,这似乎暗含在“异性恋主义”这个词里面。第二,各个民族对男性同性恋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不是本研究的焦点。第三,从18世纪末以来对男性同性恋在意识形态上及主题上的处理的确混杂了恐惧和憎恶,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用“恐”(phobic)来形容。如欲了解对恐同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出色总结,请参考墨林(Morin)与伽夫克(Garfinkle)的文章《男性恐同》(Male Homophobia)。

关——也就是说,从历史角度看,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被称为与“性”相关——将会是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本书的标题特别点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部分是要从一开始就承认我讨论的主题的局限性(并强调其严肃性),但这样的命名还有一种更正面、更重要的原因。本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探寻塑造性(sexuality)的方式,探寻哪些东西可以算作性,而这两方面都依赖于并影响了历史上的权力关系。^{〔2〕}一个推论就是,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男人和女人获得权力的途径不一样,那么,在性的结构和构成中,也会出现重要的性别差异。

比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和男性相比,“同性社会性”与“同性恋”之间的差异性对立在女性身上似乎就不那么彻底或那么地二元化。在目前这个特定历史时刻,在女性同性恋和女性对女性的其他关注形式(例如,母女纽带、姐妹纽带、女性间的友谊、“关系网”,以及女性主义的积极抗争)之间,在目的、情绪、评估等方面存在着一个清楚的连续体。^{〔3〕}这样的连续体中交织着深深的不连续性——伴随着不少恐同情绪,也伴随着种族冲突与阶级冲突——但其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现在似乎已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不论政治竞争如何激烈,不论情感冲突如何激烈,似乎此刻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那些爱着女性的女性,那些教育女性、研究女性、养育女性、哺育女性、书写女性的女性,以及那些为其他女性而游行、投票、谋求工作或为其他女性促进利益的女性,是在进行着一致的、紧密相关的活动。因此,在用“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这个形容词来形容女性纽带时(例如,历史学家卡洛·史密斯—罗森伯格

〔2〕 如欲了解这个说法的背景,请参见威克斯(Weeks),《性,政治,与社会:1800年以来对性的管理》(*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第1—18页。

〔3〕 在《强制性异性恋与女同性恋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中,爱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形容这些纽带形成了一个“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请参见斯蒂姆森(Stimpson)和佩森(Person),《女人:性别与性》(*Women: Sex and Sexuality*),第62—91页,特别是第79—82页。

(Caroll Smith-Rosenberg) 就曾这样用过),^[4]这个词并不需要被当成“同性恋”的绝对对立来使用;这个词可以清晰地命名整个连续体。

“女人爱女人”与“女人促进女人的利益”之间的连续体涵盖了性爱、社会、家庭、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它表面上的简单性和一致性,如果不是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强烈反差的话,就不会那么惊人了。当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杰西·海尔姆斯(Jesse Helms)为“家庭政策”互投赞成票时,他们是促进男人利益的男人。(实际上,他们代表了海蒂·哈特门(Heidi Hartmann)对男权的如下定义:“[男权]即男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物质基础,它们尽管是等级制的,但依然在男人之间建立或创造了相互依赖和团结,以使它们能够支配女性。”) ^[5]他们之间的纽带与男同性恋伴侣之间的纽带是否有任何一致的地方?里根和海尔姆斯会厌恶地说,不。大多数男同性恋伴侣们也会厌恶地说,不。但为什么不呢?难道“男人爱男人”与“男人促进男人的利益”之间的连续体没有像对女性那样有着天生的力量吗?

正好相反:许多关于父权结构最有用的近期作品指出,“义务异性恋”(obligatory heterosexuality) 被建构到了男性主宰的亲缘关系系统中去,或是说,恐同是诸如异性恋婚姻之类的父权制度的必要结果。^[6]显然,不论使男人彼此联系、彼此促进的各种纽带合在一起会多方便(这样做产生的对称性很有用),这样的“合”会遇到一个起阻止作用的结构障碍。从我

[4] 请参见解特(Cott)与普莱克(Pleck)的《她自己的继承:美国妇女的新社会史》(*A Heritage of Her Own: Toward a New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中《爱与仪式的女性世界》(*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一文(第311—42页);这个用法出现在,比如说,第316、317页。

[5] 撒金特(Sargent),《妇女与革命: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愉快结合》(*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中《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愉快结合:走向更进步的同盟》(*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一文,第1—41页;引文见第14页。

[6] 请参见,比如说,鲁宾的《交易妇女:关于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第182—83页。

们的社会的角度来看,不论如何,想象一种非恐同的父权形式,明显是不可能的。比如,盖尔·鲁宾(Gayle Rubin)写道,“对人类性欲中同性恋成分的压制,以及,由此推导,对同性恋者的压迫是……用其规则和联系方式压迫了妇女的同一制度的产物”。〔7〕

对同性恋者的这种父权式压迫,从历史表现上看,一直是野蛮的,而且几乎没有尽头。路易·克朗普顿(Louis Crompton)做过详细研究,并将这个历史形容为是灭绝性的。〔8〕我们自己的社会也具有残酷的恐同特征;而且,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恐同都不是任意的或无缘无故的,而是紧密地交织于家庭、性别、年龄、阶级以及种族联系构成的纤维中。如果其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不改变,我们社会中的恐同就不会停止。

然而,尚需阐明的是,由于大多数父权制度从结构上涵括了恐同,因此,父权从结构上要求恐同存在。K. J. 多弗(K. J. Dover)的近作《希腊同性恋》(*Greek Homosexuality*)似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古希腊反例。根据多弗的证据,男性同性恋在这一文化中广泛存在、合法而且深具影响。年长的男性对青少年男孩的追求在结构上以阶级为标准,而在市民阶层内部则以年龄为标准。用来形容这种追求的典型方式我们通常是用到浪漫的异性恋上去的(比如,征服、投降、“残酷的美人”以及爱的对象身上缺少欲望)。男孩在这样的关系中是被动的。但同时,由于男孩注定要成人,所以角色的分配并不是永恒的。〔9〕因此,尽管这样的爱情关系对对象具有暂时的压迫性,但也有着极大的教育作用。多弗引用柏拉图(Plato)《飨宴篇》(*Symposium*)中珀萨尼亚的话说,“对他(这个男孩)而

〔7〕 鲁宾,《交易妇女:关于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第180页。

〔8〕 克朗普顿,《同性恋灭绝:从利未记到希特勒》(*Gay Genocide: From Leviticus to Hitler*);但也请参见第5章对将“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概念用来理解同性恋男人的命运时具有的局限的讨论。

〔9〕 对于这个问题,参见米勒(Miller),《关于妇女的新心理学》(*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第1章。

言,为改进他的头脑和性格的人提供任何服务都不为过”。^[10]那么,尽管有情欲成分,这也是一种师徒关系纽带;男孩们成为学徒,学习作为一名雅典市民的方式和道德标准,并继承了市民才能享有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掌握男女奴隶劳动的权力,以及掌握包括他们自己阶级在内的任何阶级的妇女的劳动的权力。“妇女和奴隶属于同一类人,并生活在一起,”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清楚的阶级控制系统和性别控制系统是男性文化最看重的东西的必要部分:“对劳动的蔑视最初(起源)于一种对不受制于必须的自由的热烈追求,以及一种同样热烈的不耐烦——对任何不留痕迹、没有丰碑、不留值得记忆的功绩的努力的不耐烦”;^[11]因此,被蔑视的劳动就被留给了妇女和奴隶。

我认为,希腊人这个例子证明了,尽管异性恋对于维系任何父权形式都是一种必要,而恐同,至少是针对男性的恐同,则不是。实际上,对希腊人而言,“男人爱男人”与“男人促进男人的利益”之间的连续体,似乎是延续无间的。用我们的话说,就好像是在大陆浴场夜总会(Continental Baths)*的男性纽带与波西米亚林(the Bohemian Grove)^[12]的男性纽带——或者说,在会议室里或上议院衣帽间里的男性纽带——之间,并没有感觉得到的不连贯。

那么很清楚,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不对称,即女性同性社

[10] 多弗,《希腊同性恋》,第91页。

[11] 阿伦特,《人类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第83页;引用于里奇,《论谎言、秘密和沉默:1966—1978文选》(*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1966—1978*),第206页。

* “大陆浴场”于1960年代在纽约市曼哈顿开张,是包含了大浴室的著名综合性娱乐场所,前期顾客主要是男同性恋者;它在70年代关闭。

[12] 波西米亚林是美国统治阶级男性的一个全男性夏季营;对它的介绍,请参见多姆霍夫(Domhoff)的《波西米亚林及其他营地:关于统治阶级凝聚力的研究》(*The Bohemian Grove and Other Retreats: A Study in Ruling-Class Cohesiveness*);范·戴尔·塞(van der Zee)的《地球上最伟大男子们的派对:波西米亚林内幕》(*The Greatest Men's Party on Earth: Inside the Bohemian Grove*)中也有生动——尽管也具有恐同意味——的描述。